

- 师范不立，学堂皆空谈！ -

论梁启超师范教育思想的历史创见与当代启示

梁启超1896年所作《论师范》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系统专论师范教育的纲领性文献，其提出的“师范为群学之基”的思想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本文旨在深入剖析《论师范》一文的历史创举与超前设计，探讨其以“中西课程融合”与“师范生兼教习”为核心的改革蓝图，并以此为镜鉴，对当下师范教育“重技术轻理想”的倾向进行现实拷问，最终回归梁启超“师者使命观”的精神内核，为当代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历史参照与思想资源。

历史创举：

首倡“师范为群学之基”的划时代意义

19世纪末，清王朝在甲午战败的震撼中风雨飘摇，洋务运动“器物层面”的改良被证明无法挽救危局。有识之士开始将目光投向“制度与人才”的深层变革，维新思潮涌动。在此背景下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896年在《时务报》发表宏文《变法通议》，《论师范》即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章，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兴办新式教育的根本在于师范。

01 《论师范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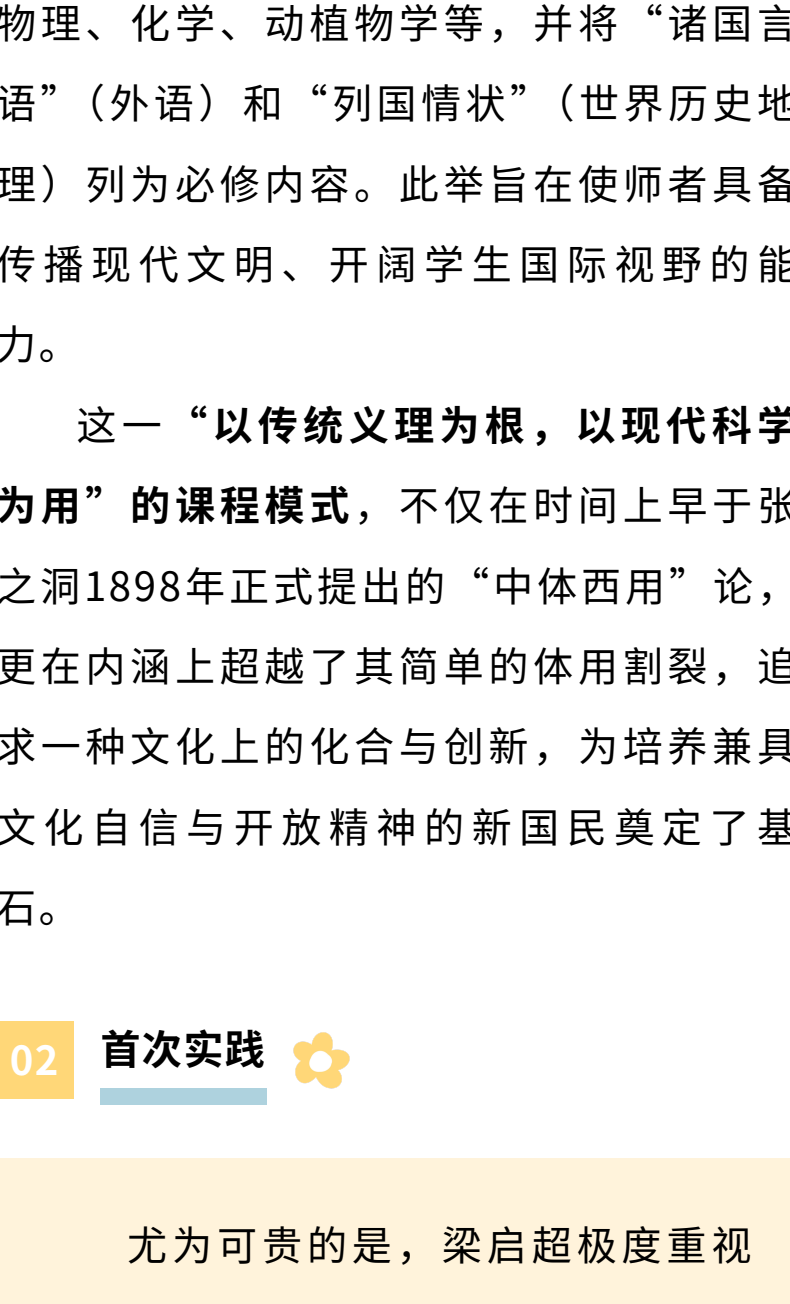
其一，《论师范》是中国近代首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的文献，具有理论开创性。在梁启超之前，虽有个别人士（如盛宣怀在办理北洋大学堂时）意识到师资问题，但从未有人将其提升至国家教育战略基石的高度进行系统论证。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：“师范学校立，而群学之基悉定”。他深刻地认识到，没有合格的教师，一切新式学堂的创办都是空中楼阁，“师范不立，则学问之荒陋，人才之衰微”即成必然。这一论断比1902年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前身）设立师范馆、中国官方系统性开办师范教育早了整整六年，体现了其思想的超前性与预见性。

02 “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”

其二，他旗帜鲜明地主张“欲革旧习，兴智学，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”，确立了师范教育的优先地位。梁启超尖锐地批判了当时两种失败的教育模式：一是传统的科举制教育，其培养的旧式学究“六艺未卒业，四史未上口，五洲之勿知，八星之勿辨”，知识结构陈旧腐朽，无法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；二是洋务派兴办的西学堂，过度依赖外国教习，存在“言语不通，教术各异”、“操术疏、责效浅”、“薪俸巨、经费窘”等五大弊端，其结果往往是培养出一些“几成左衽”（近乎全盘西化）而于国情无补的学生。因此，他得出结论：唯有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师范学堂，培养本国师资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式教育的人才危机，此为变法图强的“第一义”。

超前设计：

中西融合的课程体系与实践导向的培养模式



梁启超并非空谈家，他在《论师范》中精心勾勒了一套系统而超前的师范学堂建设蓝图，其核心在于“中西融合”与“实践导向”。

01 课程融合中西

梁启超的课程设计旨在培养既根植中华文化、又具备现代科学视野的“通儒”型教师。他主张师范生必须：

“通习六经大义”：深入研读《孟子》、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，汲取其中的“民本”、“大一统”、“夷夏之辨”（可转化为民族意识）等思想精髓，以此确立文化主体性和道德根基。这并非守旧，而是为了避免当时“尽弃国学”的激进倾向，确保文化传承不断层。

“分学格致诸科”：同时，必须系统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（格致学），如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动植物学等，并将“诸国言语”（外语）和“列国情状”（世界历史地理）列为必修内容。此举旨在使师者具备传播现代文明、开阔学生国际视野的能力。

这一“以传统义理为根，以现代科学为用”的课程模式，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张之洞1898年正式提出的“中体西用”论，更在内涵上超越了其简单的体用割裂，追求一种文化上的化合与创新，为培养兼具文化自信与开放精神的新国民奠定了基石。

02 首次实践

尤为可贵的是，梁启超极度重视教育实践，首创了“师范生兼教习”的制度设计。他明确提出应在师范学堂内设立附属小学，让师范生在“讲诵之余，令见习小学校生徒之授业”。这意味着师范生不仅仅是知识的接收者，更必须进入真实的教学场景，进行“临床实践”，将理论应用于实践，在实践中反思理论。

这一思想在1897年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得到首次实践，学生上午学习理论，下午则赴外院（小学堂）进行教学实习，开创了中国教育实习制度的先河。1902年《钦定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》更将其制度化，规定“师范生就附属小学实习教授法，由教习评定等差”。梁启超的理念比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的“从做中学”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早了近二十年，其前瞻性令人叹服。他旨在通过实践，培养教师的教育机智、管理能力和对学生的深切关怀，使其成为真正的“教育者”，而非单纯的“知识灌输者”。

现实拷问：

重技轻魂的当代师范与“师者使命观”的重建

穿越百年时空，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犹如一面明镜，照见了当下我国师范教育发展中的某些深层困境，发出了穿越历史的灵魂拷问。

今日师范教育之痛：技术理性对教育理想的侵蚀。当前，许多师范院校在办学中不自觉地陷入了“技术理性”的窠臼。评价体系过度偏向“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率”、“就业率”、“技能大赛获奖数量”等量化指标，而忽视了最为根本的“教育家使命感的培育”。师范生的培养过程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为针对考试的技能训练，导致部分未来教师“重教法轻育人”、“重知识轻人格”、“重技术轻情怀”。这与梁启超将师者视为“国民精神命脉所寄”的崇高定位相去甚远。教育部相关报告显示，师范生教育信念薄弱已成为一个潜在风险，印证了“重技轻魂”之危。

梁启超“师者使命观”的当代启示与重建路径。梁启超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重建师范教育精神的三重路径：

重申“教育乃立国根本”的使命意识：应在师范课程中大幅增加教育史、教育哲学、教育伦理学等内容的比重与深度。通过学习古今中外教育家的理想与追求，如孔子“有教无类”、蔡元培“完全人格”等，激荡师范生的教育情怀，使其深刻理解教育事业的战略价值，而非仅视其为一份职业。

重塑“师者当为通儒”的素养结构：应对抗狭隘的专业主义，打破文理壁垒。通过设立“中外经典研读”等跨学科模块，引导理科生读《论语》、《理想国》，文科生学《科学史》、《逻辑学》，培养其广博的知识视野和深厚的人文科学综合素养，成为梁启超所期望的“通儒”，从而能够更好地引领学生的全面发展。

践行“以身教代言教”的实践法则：必须彻底改革当前流于形式、周期过短（通常仅6-8周）的教育实习。应推行“一学期浸润式全岗实习”，让师范生深度参与中小学的备课、授课、班级管理、家校沟通等全部环节，在实践中体悟教育的复杂性与艺术性，真正实现“知行相资”，将“为人师表”的信念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
结语

当人工智能技术开始闯入教育领域，AI教师、虚拟课堂逐渐成为现实，我们更需重温梁启超在百年前的疾呼：“学非以治人，实以治己；教非以炫技，实以传魂”。技术永远是工具，教育的核心永远是人。失却了“魂”的师范教育，即便有再先进的技术加持，也终将使学校沦为冰冷的“知识荒原”或“算法工厂”。

梁启超的《论师范》及其师范教育思想，以其历史的创见、超前的设计和深邃的人文精神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。它提醒我们，师范教育的改革，必须超越单纯的技术与制度层面，直指“精神重建”这一根本。唯有重新锚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的本真使命，培养出更多心怀理想、身怀素养、肩扛使命的“大先生”，方能真正奠定民族复兴的“群学之基”。

-END-